

回眸与展望:改革开放30年中国翻译成果论

杜承南¹, 覃军²

(1. 重庆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媒学院, 重庆 400044; 2. 湖北民族学院 外国语学院, 湖北 恩施 445000)

摘要:文章简要回顾了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翻译事业取得的巨大成就,理清了中国翻译理论发展的基本脉络,指出了中国翻译事业不容乐观的现状,同时也指出翻译图书市场充斥着大量粗制滥造的伪劣之作这种局面的产生是由多方面因素造成的。文章分别讨论了翻译的地位问题、译者的培养问题以及译著出版等多方面的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解决方案与建议。

关键词:改革开放;翻译事业;翻译成果;回顾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5831(2009)04-0133-05

以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中华大地上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中国从此进入了集全民族智慧谋取民族复兴的全新历史时期。在这波澜壮阔的30年中,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化,综合国力不断提升,对外交流空前活跃,中国的翻译事业蒸蒸日上,硕果累累,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回顾总结中国翻译事业的光辉历程和宝贵经验,对于我们全面、深刻地认识翻译事业的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进一步推进中国翻译事业的发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一、中国翻译事业30年回眸

众所周知,千年华夏历史的长河涌现过三次翻译高潮:第一次是东汉与唐宋的佛经翻译;第二次是明清时期的科技翻译;第三次则是出现在五四运动时期,西学东渐,作为中西文化交流的开端是五四时期西方科技与文化的翻译。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出现了新的翻译高潮,而这次翻译高潮,无论就其规模之恢宏,数量之众多,质量之上乘,还是就其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贡献而言,都是前所未有的且无与伦比的。正如中国外文局副局长黄友义所说,“改革开放30年成就了我国翻译事业的大发展和大繁荣,而翻译事业作为服务于改革开放的先导力量,也为促进新时期日新月异的现代化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翻译作品琳琅满目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文学艺术领域翻译、出版的作品数量剧增,涉及语种达50多种。相继出版了《外国文艺理论丛书》、《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巴尔扎克全集》、《托尔斯泰文集》、《塞万提斯全集》等大型丛书和外国著名作家

收稿日期:2009-05-20

作者简介:杜承南(1934-),男,重庆大学文学与新闻传媒学院教授,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常务理事,重庆翻译家学会会长,主要从事中外诗歌教学与翻译研究;覃军(1981-),男,湖北民族学院外国语学院教师,硕士,主要从事翻译理论与实践及诗歌翻译研究。

欢迎访问重庆大学期刊社 <http://qks.cqu.edu.cn>

的全集和选集。据中国版本图书馆资料统计,1978年至1990年,全国年均出版翻译作品2192种;1995-2003年,翻译类新书(不包括重译和多版本译著)的数量高速增长,年均出版翻译作品超过1万种;2003年至今,出版翻译作品已超过数十万种。一批外国文学名著由名家翻译出版,如草婴译的《托尔斯泰小说全集》,孙家晋译的《泰戈尔抒情诗选》、《心笛神韵》,方平译的《十日谈》、《呼啸山庄》,郝运译的《红与黑》,祝庆英译的《简爱》,陈良廷、荣如德等译的《乱世佳人》、《斯佳丽》,吴钧陶编译的《马克吐温全集》,卢永、杜承南等译的《普希金诗全集》,叶君健译的《安徒生童话全集》等。同时,一些英国古典文学作品,如《莎士比亚全集》、《名利场》、《德伯家的苔丝》、《大卫·科波菲尔》、《艾凡赫》等也得到了复译并相继出版。为中国读者熟悉和喜爱的乔治·艾略特、夏洛蒂·勃朗特、乔叟、布莱克、拜伦、雪莱、白朗宁等众多英国诗人作家的翻译作品也相继问世。

在20世纪70年代末,外国文学中的西方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名著首先被大量翻译。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西方一些现当代通俗文学作品也逐渐进入中国读者的视野。《尼罗河上的惨案》、《珍妮的肖像》、《飘》、《假如明天来临》、《查特莱夫人的情人》等作品,对中国人的思想观念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和巨大的冲击,在读者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汉译学术名著丛书》代表了近年来中国汉译学术名著的突出成就。该丛书自1981年编辑印行,至今已达400种,涉及的科目包括哲学、政治、经济、历史、社会学、法律、地理、语言等领域。

改革开放以来,大量西方文学作品的翻译,让中国读者逐渐看到了西方文学作品在思想内容和表现手法上的亮点,进一步了解了世界文学的精髓。如《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选》、《当代诺贝尔文学奖作品丛书》、《拉丁美洲文学丛书》等作品的译介,对中国本土文学的创作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

在积极介绍西方文化的同时,中国的翻译家也将中国的优秀作品译成外文,为国外的读者打开了了解中国的窗口。杨宪益夫妇是这方面的杰出代表,他们翻译的《红楼梦》英文版于1978-1980年由外文出版社分三卷出版,对介绍中国国粹精华功不可没。此外,他们还专门介绍了有代表性的中国文学作品,如《史记》、《资治通鉴》、《楚辞》、《长生殿》、《牡丹亭》、《宋元话本选》、《唐宋诗歌散文选》、《魏晋南北朝小说选》、《十五贯》、《儒林外史》、《聊斋志异》、《老残游记》、《鲁迅全集》等百余部作品,共约1000万字,成为中国译坛交响乐中的华彩乐段。在

此期间,中国大量的古代各类文化典籍也都被译成了外文,如许渊冲先生在国内外出版中、英、法文著译60余本,包括《诗经》、《楚辞》、《李白诗选》、《西厢记》、《唐宋词选一百首》、《中国古诗词三百首》、《宋词三百首》、《汉魏六朝诗一百五十首》、《元明清诗一百五十首》、《人间春色第一枝》、《中诗英韵探胜》等,全面、系统地向西方世界介绍中国的文化典籍,诗词精品。这一意义非凡的工程,在国内外获得了一致好评。

与此同时,一大批外文报刊,如《今日中国》、《北京周报》、《人民中国》、《中国日报》、《中国画报》等报刊用不同的语言向世界182个国家和地区发行。新华通讯社、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海外英文频道和西班牙语法语频道等也为向世界介绍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做了大量让世界人民了解中国之翻译的传播工作。中国的翻译工作在世界文明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起到了不可或缺的先导与桥梁作用。

(二) 翻译理论硕果盈枝

随着翻译实践的丰富,中国翻译理论研究30年来也有了长足的进展,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可以这样说,中国翻译理论现在正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蓬勃推进,方兴未艾。江枫先生曾这样评价道,“当今翻译理论研究的流派之众、方法之多、视域之广、观点之新、跨度之大、成果之丰,可谓空前”。纵观中国的翻译史,我们可以看出,翻译理论经历了“文质说”、“求信说”、“直译意译说”、“神化说”、“优势竞赛论”与“和谐说”的讨论,经过了科学与艺术关系的争论、理论与实践关系的争论、规划与异化关系的争论。罗新璋曾把中国传统的翻译理论体系归结为四种基本思想:“案本—求信—神似—化境”。我们也可以看出,中国翻译理论大致是沿着这样一条轨迹发展的:从最初一丝不苟模仿原文句法的“质”(直译)发展成允许在句法上有一定自由的“信”(意译),最后在“信”的基础上,演变成充满创造精神的“化”。因此,翻译理论的发展,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中国翻译理论的更新与提高便是在传统理论的基础上更新与提高起来的。

黄龙先生几十年呕心沥血,写成了《翻译学》一书。该书是目前中国大陆唯一标明“翻译学”的专著,系统地提出了一系列见解,如:唯物辩证观;知行统一观;三位一体观;体貌相称观;寓美于微观;信息时代观;智能科学观。这些正是当代翻译学的指导原则、研究对象与范围。许渊冲先生提出了诗词翻译的“三美”论(意美、音美、形美),后又相继提出文学翻译的“三似新论”(形似、意似、神似)、“三化”论(等化、浅化、深化)、“三之”论(知之、好之、乐之)等,对诗歌翻译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著名翻译家刘宓庆共有11部专著,其中包括《文体与翻译》、《英汉翻译技能指引》、《新编当代翻译理论》、

《新编汉英对比与翻译》、《翻译美学导论》、《翻译与语言哲学》、《文化翻译论纲》、《翻译教学:实务与理论》、《口笔译理论研究》、《中西翻译思想比较研究》及《刘宓庆翻译散论》。全面探讨了现当代译学几乎所有的理论问题,其中有些著作更是中国当代翻译理论的扛鼎之作。刘宓庆前期的学说建立在传统译论及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基础上;后期的理论观则以维根斯坦的语言哲学为导向,具有超前性,引起国际学术界的重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的翻译理论提高了中国译论在世界译坛的地位,因为即使在翻译研究更为发达的西方迄今尚无人构建出如此完整、如此合乎逻辑的理论体系。

此外,翁显良先生在其《意态由来画不成》一书中指出原作意象的隐或显、婉或直、艳丽或质朴、庄重或谐谑都是可译的。谭载喜的《文化对比与翻译》、《新编奈达论翻译》、许均的《翻译思考录》、廖七一的《当代英国翻译理论》等著作,大大拓宽和加深了对翻译本质的认识。郭建中的《文化与翻译》理清了文化与翻译的各种关系。赵艳彦春的《翻译归结论》提出以归结主义方法论探求翻译本体论问题并建立相应的学术体系。杜承南、文军主编的《中国当代翻译百论》收纳了近百名大家的译评、译论。曹明伦的《翻译之道:理论与实践》重新辩证了翻译理论与实践的互动关系,辨析了译介学与翻译学之间的差异。还有张今的《文学翻译原理》、方梦之的《科技英语实用文体》、刘重德的《文学翻译十讲》、金堤的《等效翻译探索》等,这些著作有的研究了文学中的翻译艺术,有的探讨了科技、新闻、社科、公文和应用文等不同文体翻译的特点与技法。

在中国译论大力发展的同时,大量西方现代语言学理论、翻译理论以及许多其他相关学科的理论也被陆续译介到中国,极大地拓展了中国翻译工作者的视野,扩宽了不同的崭新视角。其中,影响较深的有奈达(E. Nida)提出的功能对等或动态对等理论、纽马克(P. Newmark)的语义翻译与交际翻译理论、韦努蒂(Venuti)的文化帝国主义理论、费米尔(Vermeer)的功能目的论、勒菲弗尔(Lefevere)的赞助人、诗学、意识形态三因素论,以及格特(Gutt)提出的关联翻译理论等。作为研究翻译乃至审视译者的内心活动,跨越了“怎样译”、“直译还是意译”等争论不休的局限与束缚。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文化转向(cultural turn)”口号的介入。1990年巴斯耐特(Bassnett)与勒菲弗尔(Lefevere)在其合著的《翻译、历史与文化》一书的序言中提出了著名的翻译研究中的“文化转向”,“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从此文化问题成了翻译研究中的热点,论著迭出。译界学人对翻译的文化因素、翻译文化以及文化翻译等相关问题展开十分热烈的探讨,众多译者群起响应,以文化研究的视角,从事翻译研究。如刘宓庆的翻译与语言哲学理论、周方珠的翻译多元理论、李运兴的

语篇翻译理论、包惠南的文化语境与语言翻译理论和金惠康的跨文化交际翻译理论等,真可谓众论纷呈,不一而足。由此可见,改革开放的30年,是中国翻译理论飞跃发展的30年,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派生机勃勃、热气腾腾的景象。

(三)译坛盛事——世界翻译大会在沪召开

在第17届世界翻译大会上,中国翻译协会申办第18届世界翻译大会并取得了成功。2008年8月2日至7日,各国译坛高手,文化传媒精英,云集上海,躬逢盛会。黄友义先生指出,“第18届世界翻译大会不仅是中国翻译界的一件大事,也是整个文化界的一件大事,是展示中国形象,增强中国文化软实力的一次重要契机”。他表示,国际翻译家联盟成立50多年来,由该联盟组织的世界翻译大会已经举办了17届,但从未在亚非拉地区举办过。中国成功取得2008年第18届世界翻译大会的主办权,“得益于中国政治稳定、综合国力的增长,得益于中国翻译事业的进步,充分体现了国际译联和国际翻译界对中国社会的进步、对中国译协和中国翻译事业的广泛认同,对于提升中国翻译界的国际影响,推动中国翻译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大会的主题是“翻译与多元文化”,强调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必将引起对于文化多样性的共同关注,翻译在促进人类文明发展和多元文化共生共融中的重要作用愈益彰显。来自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2000名业界代表参加了会议,联合国和欧盟组织相关机构领导人及中外文化学术界精英参加大会并作了主题演讲。第18届世界翻译大会无论在内容、形式和规模上都是国际译联史上前所未有的。正如黄友义先生所说,“大会的成功举行,不仅是展示中国翻译界成果、加强国际翻译界合作交流的过程,更是让世界感知中国、了解中国、见证中国改革开放成就的过程。大会的成功举办对于提升中国国际影响力、加强中外文化交流、对外树立良好的国家形象,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当前面临的问题

综上所述,以改革开放为契机,中国迎来了有史以来第四次翻译高潮。各种外国文学作品纷至沓来,令人目不暇接。大量科技、经贸等文章的翻译,促进了中国在诸多方面的进步。然而,毋庸讳言,翻译界繁荣的表象掩盖不了高端翻译人才的匮乏。这表明中国翻译事业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还存在着不少问题。笔者将从以下几方面探讨造成眼下中国文学翻译窘境以及制约其进一步发展的有关问题。

(一)翻译的地位问题

在中国,翻译工作者的社会地位还比较低,无法吸引许多有能力、有才华的人从事这项职业。尽管长期以来有关翻译和创作应该平起平坐、一视同仁

的呼声此起彼伏,从未间断,但现实情况却很难令人乐观。再加上当今社会弥漫着一种浮躁、急功近利的风气,年轻人深受影响,不愿静下心来从事研究,进行著译,而热衷于短期效应,立竿见影。学外语的,在市场上搞同声翻译,一天可以挣好几千,搞文学翻译千字却只有五六十元。而译千字文却比教一节课题难得多,何况译后能否发表出版还是个未知数。文学翻译是吃力不讨好的苦差事,价值难以体现。再之,而今从事文学翻译的人主要是高校教师和出版社的编辑,他们的翻译作品在评职称时却派不上用场,不能成为相关规定中的“学术成果”。如此这般,既无利又无名,只有“傻冒”才愿长久坚持下去。中国文学翻译人才“青黄不接”已经成为人所共知、不容回避的现实。

(二)译者的培养问题

反观眼下的翻译界,很难找到愿意长期坐冷板凳专事翻译的人,文学翻译或诗歌翻译更是青黄不接,后继无人,这是老一辈翻译家共同的忧虑。文学翻译是一项艰苦细致的工作,译者需耐得住寂寞,既要掌握精深的专业知识,娴熟的语言功底与技能,又要有渊博广博的才识,也就是成为人们所说的“杂家”。中国许多著名的翻译家如鲁迅、茅盾、朱生豪、郭沫若、傅雷、冯至、卞之琳、钱钟书、季羨林等,都是学贯中西的大家,都是集创作与翻译于一身,有着深厚的文化修养,而他们的外语水平也同样令人钦羡与赞叹。

众所周知,这些年来,中国诗歌翻译作品也出版了不少,质量却每况愈下,令人不敢恭维。毛病何在?笔者认为,要译诗,必先要读诗、懂诗、爱诗、写诗。傅雷先生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译者要认清自己的所短所长,不善于说理的人不必勉强译理论书,不会作诗的人千万不要译诗,弄得不仅诗意全无,连散文都不像”。另一位翻译泰戈尔《飞鸟集》与《新月集》的译坛耆宿郑振铎先生也表达了相似的看法,“译诗,如果译出来丑化了或者读者看不懂,则反不如不译的好。这种工作应该让有能力的人去做”。事实正是如此,优美的译笔能把白兰地变成五粮液,而拙劣的译笔则把威士忌变成了苦丁茶,白开水,不仅不能传神,而且味同嚼蜡,令人难以卒读。这是中国不少译诗者的弱项软肋,是译者之过也,不能抱怨外国诗人名实难副,浪得虚名。我们热心的读者朋友往往将板子打错了屁股。同时,这也说明为什么近年来精彩诗歌译作愈来愈少,脍炙人口的译诗几乎成了绝无仅有的“广陵散”,华南虎。

总起来说,要译好作品,译者就必须多读书,多实践,努力提高双语水平,加深中西文化修养,翻译时方可得得心应手,左右逢源。只有“知己知彼”,方可“百战不殆”。正如建造一座文学翻译的“金字塔”,须根基牢固、厚重、扎实,才会有挺拔伟岸、高耸云端的塔尖。有人以为,只需掌握一门外语,便能从事文

学翻译,就可成为一个译著等身的翻译家。这不过是安徒生的童话,这样的译著经不起推敲,好似在沙滩上建造美丽的宫殿,不过是海市蜃楼而已,岂有他哉!

(三)译著出版的问题

翻译质量下降的背后,是翻译界和出版界对经济利益的狂热追求。勒弗菲尔(Lefevre)认为,译者若想使自己的翻译得以出版,他的自由度是很小的,很大程度上要受赞助人的制约。赞助人可以是个别的人,也可以是一个团体,如宗教团体、政党、皇室、出版商以及报纸、杂志和电视公司。出版社对翻译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译著的质量好坏取决于译者,而能否最终与读者见面,则取决于出版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出版事业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但译著出版质量却越来越让人担心。多少年来,各出版社大多存在一些不正之风,只要有“关系”,有经济利益,就可以给伪劣译品开绿灯。我们知道,诺贝尔文学奖是全球关注的文学盛事。然而正如刘习良先生所说,“获奖作品一公布,谁能够抢先推出中文版谁就抓住了市场,谁就能够赚钱”。于是出版社各显神通,迅速招兵买马,把作品分割成几块,交给译者各管一块,进行流水作业,然后再将各部分汇总打包,“攒”起来一股脑儿推向市场。这种“萝卜快了不洗泥”的做法是万万不可取的,出版社一定要严肃对待,把好质量关,不能让粗制滥造的伪劣译品败坏了广大读者的胃口。

三、建议与展望

为了解决中国翻译事业当前存在的上述问题,促使它进一步繁荣与发展,特提出以下建议,就正于译界方家与同仁。

第一,加强学科建设。直到今天,翻译还没有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学科,文学界只是将其当作比较文学或语言学的一个分支来进行研究,翻译学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要改变这种状况,翻译界应该携手共进,加强学科建设,重视理论研究,争取更多的人关心翻译事业,让翻译队伍不断壮大,翻译事业顺利发展。

第二,提高翻译的地位。学术界和社会各界应该对翻译事业更加重视,政府部门也应加大对翻译事业的投入,译者的社会报酬有待于进一步提高,高水平的译著应该作为学术成果给予肯定,予以奖励,并纳入“职称评定”的考核范围。

第三,重视人才培养。林戊荪先生曾指出:“要改变中国翻译界现状,建设真正的‘翻译强国’,必须大大加强和改进人才培养,既要努力增加数量,更要保证质量;既要精通外语,还要有中文修养;而且文学翻译和实用翻译应当并重。”因此,高校教育应加强翻译教学,注重培养学生的双语水平及对外国人文历史的理解和掌握,在有条件的高等院校均应设立翻译学科的硕士博士学位点,从而培养多层次的

翻译人才。

第四,重视“中书西译”。在中西文化交流的近百年间,我们已经翻译介绍了大量的西方精神文化产品。当今,英语被作为国际语言越来越多地广泛运用,中国文化出现了“西化”的倾向,为了改变这一状况,真正做到与发达国家平等的交流和合作,翻译界必须加强对外翻译,着重向外介绍中国现代文化和传统文化的经典作品。

第五,规范翻译行业。到目前为止,中国还没有一个政府部门来主管翻译事业,没有一个统一、完整、系统的政策规范到位。现在从北京到地方的相关公共场所,如机场、车站、餐厅、宾馆等处的英语翻译出现的各类错误,触目可及,不胜枚举,令人不知所云,不忍卒读。在北京奥运前夕,甚至有洋人自告奋勇义务为我们纠偏改错,真令中国从事外语翻译的人面红耳赤,无地自容。要改变翻译领域这种“泥沙俱下,鱼龙混杂”的混乱局面,必须尽快建立翻译人才和机构的准入、评估等相关管理办法,促进翻译行业规范化。

四、结语

众所周知,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的翻译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涌现了一大批高水平的著名译,对世界文化交流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同时,我们也清楚地看到尽管当前的翻译高潮为中国文化事业的发展输入了新的血液,注入了新的活力,使中国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不断交融,加速发展,但中国翻译工作者仍然任重而道远。必须建立一整套系统的行之有效的翻译理论与原则,用以指导蓬勃发展的翻译事业,将中国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古代经典

以及日新月异、精彩纷呈的当代文学作品有条不紊地推向世界,并使之进一步发扬光大,这将是历史悠久的中华民族奉献给世界各国人民的一份极其珍贵的礼物。

参考文献:

- [1] 2006年全国新闻出版业期刊情况统计摘要[EB/OL]. (2007-11-12). http://www.cppinfo.com/common/Bulletin/Bulletin_content.aspx?key=66&lmgl_id=508.
- [2] 曹明伦. 翻译之道:理论与实践[M]. 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7.
- [3] 郭建中. 当代美国翻译理论[M].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
- [4] 侯若虹. 翻译事业在中国[J]. 对外传播, 2008(7):6-11.
- [5] 黄友义. 发展中国翻译事业更好地为对外开放服务[J]. 求是,2008(10):57-60.
- [6] 穆雷. 世纪之交看译学建设[J]. 中国翻译,2001(3):13-16.
- [7] 乔榛. 中国文学翻译现状思考[J]. 四川教育学院学报, 2006(11):24-29.
- [8] 孙致礼. 新时期中国英美文学翻译水平之我见[J]. 中国翻译, 2008(3):49-51.
- [9] 张景丰. 从中国历史上四次翻译高潮谈翻译理论的发展[J]. 语言与翻译, 2002(3):48-51.
- [10] 范思勇. 中国翻译实践与理论发展回顾与展望[J]. 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1):144-146.

A Review and Prospect of Translation Achievements in China in 30 Years' Reform and Opening-up

DU Cheng-nan¹, QIN Jun²

(1. College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Chongqing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44, China;

2.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Hubei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Enshi 445000, China)

Abstract: The authors give a brief review of translation achievements in China in 30 years' Reform and Opening-up and clarify the basic skeleton of development of translation theories. They also point out the optimistic situation of translation undertaking and that plenty of poor-quality works are flooded in the translation book markets, which are caused by multiple factors. Then the problems of translator's position, translators' training and publishing of translation works are discussed here. At last some solutions to these problems and suggestions are presented.

Key words: reform and opening-up; translation undertaking; translation achievements; prospect

(责任编辑 胡志平)